

張說與集賢院

盧意寧

一、前言

關於玄宗時集賢院的建立經過、性質和規制，學界已有多篇論文發表，其中以池田溫、劉健明兩位學者的討論最為詳盡。¹前者對於集賢院的性質有獨到的見解，認為集賢院既不像弘文、崇文、廣文等館閣兼有教授貴族子弟的職責，也不似翰林院直接參與政治機密，而是一純粹的文化學術機構，專門以「斯文藝能為己任」。後者則是藉由分析張說、張九齡政治影響力的消長，討論集賢院職能的轉變及興衰起落的過程。在這兩篇文章中，張說皆被視為主導集賢院發展的關鍵人物，至於到底張說的那些思想或作為影響了集賢院成立的宗旨和之後的走向，池文只是約略提及，並未詳細說明，劉氏著墨較多，對於集賢院的職能和張說政治理念間的關聯性作了相當清楚的論述，但也非專門立論。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想針對上述問題作一補充說明。下文將先略述集賢院成立的過程，之後再專就張說在執掌集賢院任內的幾項重要作為做討論。

二、集賢院成立的經過

集賢院正式成立的時間是開元十三年，它的前身為於開元十年成立的麗正書院，而麗正書院的成立又與開元初年以來開展的修書運動有很大的關係，是以為瞭解整個來龍去脈，有必要先從初年的修書運動談起。

玄宗自登位後，有感於內庫書籍「皆是太宗、高宗先代舊書，常令宮人主掌，所有殘缺，未遑補緝，篇卷錯亂，難於檢閱」²，於是在開元三年時要求侍讀馬懷素、褚無量整比古今圖籍，兩人正式開始工作是在開元五年，地點是在東都的乾元殿，但工作進行的並不順利，可能是因馬懷素「不善著述」³所致，開元六年馬懷素去世，他未完成的使命之後由褚無量接續。開元六年時，玄宗從洛陽回到長安，書籍也隨之移回西京的麗正殿，開元八年，褚無量去世，以「麗正寫書未畢為恨」。玄宗又任命元行沖領導麗正院校書，終於在開元十年完成了一部二百多卷的大型圖書目錄，名為《群書四錄》。然而玄宗對這樣的結果可能是不滿意的，因為苦心完成《群書四錄》的最大功臣元行沖並未在獻書後得到任何實質的賞賜，只是口頭嘉勉而已，甚至在不久後就被免去麗正書院的職務。⁴

開元十年九月，玄宗任命張說接替元行沖的職責，繼續領導修書活動。開元

¹ 鄭偉章，〈唐集賢院考〉，《文史》1983年19輯（北京），頁65-85；趙永東，〈唐代集賢殿書院考論〉，《南開學報》1986年4期，頁12-20；李湜，〈盛唐時期的集賢學士〉，《江西師範大學學報》1995年3期，頁31-34；劉健明，〈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黃約瑟、劉健明合編《隋唐史論集》（香港：香港大學亞州研究中心，1993），頁54-64；池田溫，〈盛唐之集賢院〉，收入《唐研究論文選集》（北京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頁190-242。

² 劉昫等編，《舊唐書·經籍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46，頁1962。

³ 歐陽修等編，《新唐書·儒學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199，頁5684。

⁴ 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濟南：齊魯書社出版，2005），頁186。

十三年，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以張說知院事。張說在入主麗正、集賢院後不再只是被動地執行玄宗交付的修書任務，而是主動地將其政治主張、思想理念貫注於院務之中。

三、張說與集賢院

1. 「引進文儒，詳觀古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

在玄宗還未登位前，身為太子侍讀的張說就曾建議他：

臣聞安國家、定社稷者，武功也；經天地、緯禮俗者，文教也。社稷定矣，固寧緝於人和；禮俗興焉，在刊正於儒範。順考古道，率由舊章。故周文王之為世子也，崇禮不卷；魏文帝之在春宮也，好古無怠。博覽史籍，激揚令聞，取高前代，垂名不朽……臣愚伏願崇太學、簡名師，重道尊儒，以養天下之士。今禮經殘缺，學校凌遲，歷代經史，率多紕繆，實殿下闡揚之日，刊定之秋。伏願博採文士，旌求碩學，表正九經，刊考三史，則聖賢遺範，燦然可觀。況殿下至性神聰，留情國體，幸以問安之暇，應務之餘，引進文儒，詳觀古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降溫顏，聞讜議，則政圖理體，日以增益，繼業承祧，永垂德美。⁵ 在這篇〈上東宮請講學啓〉中，張說主要是希望東宮能復興學校、重振儒學，並且廣引文儒與之研讀古代典籍、討論前代施政之利弊得失。據《舊唐書·儒學傳》序言云：

高宗嗣位，政教漸衰，薄於儒術，尤重文吏，於是醇醜日去，華競日彰，猶火銷膏而莫之覺也。及則天稱制，以權道臨下，不吝官爵，取悅當時，其國子祭酒，多授諸王及駙馬都尉，準貞觀舊事，祭酒孔穎達等赴上日，皆講五經題。至是，諸王與駙馬赴上，唯判祥瑞按三道而已。至於博士、助教，唯有學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實。是時復將親祠明堂及南郊，又拜洛，封嵩嶽，將取弘文國子生充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選，前後不可勝數。因是生徒不復以經學為意，唯苟希僥倖。二十年間，學校頓時隳廢矣。⁶

由上述可見在高宗、武后主政之時，儒學衰頹、學校荒廢的情況相當嚴重。在高宗朝成長、於武后朝任官的張說，很可能就是有感於前朝之弊，將之化為文章，提醒東宮勿重蹈覆轍。張說的諫言，玄宗顯然接納了，史稱他：

玄宗在東宮，親幸太學，大開講論，學官生徒，各賜束帛。及即位，數詔州縣及百官薦舉經通之士。又置集賢院，招集學者校選，募儒士及博涉著實之流。他不只是在東宮時聽取張說的建議於太學大開講論，且在即位後，設置集賢院，進一步實踐了張說「重道尊儒」、「博採文士」的主張。是以我們或可說玄宗建立集賢院是深受張說影響的結果，而他之所以會將集賢院交付張說負責，也應不只是因為張說與他關係良好且為當朝文壇領袖，而可能是玄宗知道這是張說一直以來的政治理想，他也支持，於是給予張說實踐的機會。

⁵ 張說，〈上東宮請講學啓〉，《張燕公集》（臺北市：新文豐，1985），卷13，頁136。

⁶ 《舊唐書·儒學傳》，卷189，頁4945。

張說在知掌集賢院後，果如其在〈上東宮請講學啓〉所言，熱中於引薦文儒進入集賢院充學士、侍講、校理等職。當然，這與他「喜延納後進」⁷的個性應也有所關聯。而張說「引進文儒」的主要目的，是希望他們能與玄宗一起「詳觀古典，商略前載，討論得失」；換言之，張說是欲將集賢院塑造成一個「薈萃國家賢才，輔佐君王施政及與君主講學論道之所」。⁸據《唐六典》記載：

集賢院學士，掌刊緝古今之經籍，以辯明邦國之大典，而備顧問應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其有籌策之可施於時，著述之可行於代者，較其才藝，考其學術，而申表之。⁹

由上引史料可知，徵引賢才入院以備君王顧問諮詢是集賢院重要的職能之一，而這與張說向來的政治理念相符合，可見張說對於集賢院的主導力。

2. 「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

劉健明先生認為張說為了加強集賢院在朝中的地位，又由於生性尊禮文士之故，遂致力於提高學士的地位，一方面是為達到前述的目的，另一方面是為讓他們能更盡心輔助君王、與之講學論道。¹⁰但本文認為，張說不僅是提高了學士的地位，同時也對學士的定位和地位作了一番新定義。為了能更明白張說的主張與前人之不同，下文將先略述前代學士制度的概況。

學士作為職官名始於南朝，為宋明帝於泰始六年(470)所置。其後齊、梁、陳各朝也都有設置學士官。隨著南風北漸，北方也於北齊時出現學士官的設置，北周不久後跟進，隋代亦然。¹¹顯然，學士制度本是南方文化的產物，是以北方開館設置學士官的舉動，可視為南方文化強勢入侵的結果。唐代雖以西魏北周以來組成的關隴集團為政治核心，但在文化上依舊抵擋不了「江左餘風」的影響，自唐初開始，便開館徵引學士。初唐最有名的學士群體，即是唐太宗在還未即位尚是秦王時，於武德四年(621)開文學館時所引進的房玄齡、杜如晦等十八學士，由於這批學士輔助太宗取得大位的智囊團，其中又有多人在太宗朝中位居要職，與太宗間的關係也相當親近，故被後世傳為美談。太宗即位後，又另開弘文館招納學士，館內學士有不少人是之前十八學士的成員。到了高宗、武后時期，由於「高宗尚吏事，武后矜權變」¹²，無意大興文教，弘文館基本上沒落了。但在武后時期，仍有二批學士群體值得提出來討論，分別是北門學士和珠英學士。北門學士大概設立於上元年間，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高宗欲遜位武后，卻遭到朝臣的強烈反對。武后於是找了元萬頃、范履冰等中級文學侍從官作為她奪權的幫手。¹³珠英學士則是因編修《三教珠英》而得名。《三教珠英》是武后令其寵臣張易之、張昌宗負責編修的一部大型類書，目的是為彌補兩人在宮廷內因舉止放浪形骸而

⁷ 《舊唐書·張說傳》，卷 97，頁 3056。

⁸ 〈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頁 58。

⁹ 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 9，頁 280-281。

¹⁰ 〈論唐玄宗時期的集賢院〉，頁 56-57。

¹¹ 相關討論請參見：李福長，《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頁 21-40。

¹² 《新唐書·儒學傳序》，卷 198，5639。

¹³ 關於北門學士的詳情，請參見：劉健明，〈論北門學士〉，《中國唐史學會論文集》(西安市：三秦，1989)。

招致的惡評。至於在中宗、睿宗時，則有脩文館(前弘文館，景龍二年更名)學士，有學者統計共有三十人，規模相當龐大。¹⁴

至於南北朝學士的職掌，大概以編修書籍(尤其是大型類書)、參與禮儀制定為主。而他們也常在修書之餘，在宮廷中舉行文會，相互切磋文學技巧，而文會的主辦人常是皇帝或貴戚，是故他們的身份不僅是學士，也是宮廷文人、文學侍從。也正因其常圍繞在君王、權貴的身旁，故易於捲入政治鬥爭或宮廷內鬥之中，命運也隨之浮沉。這樣的情況至唐初亦然。文學館設立的目的是為「引禮度而成典則，暢文詞而詠風雅」，弘文館學士的職務則多是負責制禮設樂、撰述修史等事。¹⁵基本上，兩館學士的職能與南北朝大同小異。武后、中宗、睿宗朝的北門學士、珠英學士、脩文館學士，也都有從事書籍的編纂活動。其中，珠英、脩文館學士陪同君王、貴戚宴遊的次數特別頻繁，留下大量相互唱和的詩文。而北門、脩文學士則因涉入險惡的政治鬥爭之中，最後大多不得善終。總結上文可知，從南北朝到唐初，學士是君王、權貴徵引來輔助文治的重要幫手；他們的另一面貌則是以文學技巧來取悅後者的宮廷文人，依附性強、獨立性少。對於這樣的情況，曾預於珠英、脩文學士之列的張說似乎有所反省。下文試申述之。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在改組麗正書院為集賢院後，命張說繼續執掌院事。張說當時本官為中書令，也就是說，他是以宰相之尊兼知院事，故玄宗欲命他為大學士，以示榮寵和尊重，張說卻婉拒了玄宗的提議，理由是：

初以張說為大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如臣豈敢以大為稱？上從之。¹⁶

所謂「中宗欲以崇寵大臣，景龍中修文館有大學士之名」一事，指的是在景龍二年(708)時，中宗擴充修文館，設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其後又有陸續的增補。中宗徵引學士入館的舉措，其實是因襲前朝故事，但與前朝不同的是他在原本的學士稱號前加上一大字，以明等第高下。張說在景龍三年時，也被選為修文館學士，但他顯然不贊成中宗置大學士的作法。張說之所以會堅辭大學士的頭銜，應不是表面上故作謙虛姿態，而是對於「學士」一職的定位和地位自有一番新見解所致。《大唐新語》卷7〈識量〉第14記：

張說拜集賢學士，於院廳讌會，舉酒，說推讓不肯先飲，謂諸學士曰：「學士之禮，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說聞高宗朝修史學士有十八九人，時長孫太尉以元舅之尊，不肯先飲，其守九品官者亦不許在後，乃取十九杯一時舉飲。長安中，說修三教珠英，當時學士亦高卑懸隔，至於行立前後，不以品秩為限也。」遂命數杯一時同飲，時議深賞之。¹⁷

在與集賢院學士聚會的場合中，張說向諸學士闡說他對於學士之禮的理解：不應以官位分高下，彼此間應是以道德義理相切磋。由此也可見張說拒絕受大學士稱號的舉動，是有其一貫的思想信念在支持著。張說主張不以學士間不應以官品區

¹⁴ 冉旭，〈唐景龍至開元前期的學士詩人〉，《中州學刊》2003年6期，頁120。

¹⁵ 《唐代學士與文人政治》，頁94

¹⁶ 《唐會要》，卷64。

¹⁷ 劉肅，《大唐新語》卷7(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03。

隔地位，似乎是發前人之所未發，具有特殊的意義。前此，學士之所以被視為美職，主要是因其職務便於和皇帝、貴戚親近，從而易於取得晉身的好機會。但張說卻認為朝廷授與的官品對學士而言是身外之物，學士應看重的是學識品德。張說的想法在下段引文中有更清楚的陳述：

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並謝迄，謁宰臣。源侍中(乾曜)曰：「賀公文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以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然，終是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詞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以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¹⁸

中唐韋溫曾說「國朝以來，郎官最為清選，不可以賞能吏」¹⁹，唐人對於郎官一職的渴求和重視可見一般，張說卻說「非往賢所慕」，顯然並不符合歷史事實，為的是突顯學士地位的崇高和獨立。張說認為學士和侍郎最大的不同在於：侍郎即使清貴，也不過是食朝廷奉祿的一名官員罷了，而學士卻是先王之道的承載者，兼有高妙的文彩和廣博的學識，且足以為「縉紳軌儀」。這樣的想法和「學士之禮，應以道義相高，不以官班為前後」之論調相互呼應，都帶有不欲以身份、地位作為衡量知識份子高下的標準，而純以學識和文才來判別其良莠的意味。

總結上文，張說對於學士之職的期許和認知，反應出二個重要的意義：其一，前代學士是一群活躍於宮廷文會之中，圍繞在君主、權貴身邊的宮廷文人，他們以文學技巧作為晉身之階，以位居高官，成為寵臣為榮。張說卻強調學士懷抱先王之道，彼此間應以道義相高，而不該只具備文學技能，不應以官位高低相區隔；且他似乎也不贊同學士以文才取媚於君王、貴戚，反之，他認為學士因肩負先王之道而地位崇高，足以作為「縉紳」之表率，隱然有以道自任，而不以名位為念的意涵。其二，中古選才的標準重身分、地位，而張說卻欲將標準轉換為才學，這顯示出張說認為學士要以內在的學養名世，而非靠外在的官品，學士的獨立性因而提高。此外，在這些想法的背後可能也有打破中古賢能觀、建立新標準的意圖。

3. 「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

張說除了欲將集賢院塑造成一個學士與君王講學論道的機構，並致力於提高學士的地位外，輔佐君王成就禮樂之治則是他的另一目標。關於這點，我們可從他和陸堅的爭論看出端倪：

開元中，陸堅為中書舍人，以麗正學士或非其人，而所司供擬過為豐膳，謂朝列曰：「此亦何益國家，豈致如此費損！」將議罷之。張說聞之，謂諸宰相曰：「說聞自古帝王，功成則有奢縱之失，或興造臺池，或耽玩聲色。聖上崇儒重德，親自講論，刊校圖書，詳延學者。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永代規

¹⁸ 《大唐新語》卷 11，頁 165。

¹⁹ 《舊唐書·韋溫傳》，卷 167，頁 4379。

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為未達也！」²⁰

張說面對陸堅的質疑，他以「今之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為理由反駁，並強調禮樂是永代不易之道，嘲諷陸堅的言論是因為他不明白禮樂的重要性所致。這段史料反應出張說的兩種想法：一是重視禮樂的態度，二是欲將麗正書院定位為輔佐君王制禮作樂之機構的用心。前文曾略述南北朝至唐初學士的職掌，制定禮樂是其中一項，照這樣看來，張說的想法並不特別，但事實上不然。前代的學士參與制禮作樂的工作，只是被動地接受這樣的任務，而張說卻是積極主動、異常熱中，似乎視制定禮樂為其使命。事實上，張說在掌理麗正書院、集賢院後所進行的禮樂活動的確相當頻繁，茲引於下，以為佐證。

《舊唐書·張說傳》：

（開元十年）是歲，玄宗將還京，而便幸并州，說進言曰：「太原是國家王業所起，陛下行幸，振威耀武，并建碑紀德，以申永思之意。若便入京，路由河東，有漢武脽上后土之祀，此禮久闕，歷代莫能行之。願陛下紹斯肇典，以為三農祈穀，此誠萬姓之福也。」上從其言。及祀后土禮畢，說代張嘉貞為中書令。

²¹

張說在開元十年九月知掌麗正院後，十二月便建議玄宗祀脽上后土祠，玄宗答應了他的請求，於隔年正月祠后土於汾陰之脽上。接著又在開元十一年冬天，向玄宗議參冕事：

開元十一年冬，玄宗將有事於南郊，中書令張說又奏稱：「准令，皇帝祭昊天上帝，服大裘之冕，事出周禮，取其質也。永徽二年，高宗親享南郊用之。明慶年修禮，改用參冕，事出郊特牲，取其文也。自則天已來用之。若遵古制，則應用大裘，若便於時，則參冕為美。」令所司造二冕呈進，上以大裘樸略，冕又無旒，既不可通用於寒暑，乃廢不用之。自是元正朝會依禮令用冕及通天冠，大祭祀依郊特牲亦用參冕，自餘諸服，雖在於令文，不復施用。²²

開元十一月，玄宗親享圓丘，張說為禮儀使。

玄宗即位，開元十一年十一月，親享圓丘。時中書令張說為禮儀使，衛尉少卿韋縉為副，說建議請以高祖神堯皇帝配祭，始罷三祖同配之禮。²³

開元十二冬，張說開始積極鼓勵玄宗行封禪之禮，玄宗在經過一番推讓後，下制表示許可：

玄宗開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親及四方文學之士，皆以理化昇平，時穀屢稔，上書請修封禪之禮并獻賦頌者，前後千有餘篇。玄宗謙沖不許。中書令張說又累日固請，乃下制曰：「……可以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實，有事太山。」²⁴

為行封禪，玄宗命張說領學士、禮官草定《封禪儀注》。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禪

²⁰ 《大唐新語》，卷1，頁11。

²¹ 《舊唐書·張說傳》，卷97，頁3053。

²² 《舊唐書·輿服志》，卷45，頁1939。

²³ 《舊唐書·禮儀一》，卷21，頁833。

²⁴ 《舊唐書·禮儀三》，卷23，頁891。

儀注修成，四月，玄宗宴請中書門下及修書有功的學士、禮官，在席間下詔改麗正書院為集賢院，命張說知院事。在進入集賢院時代後，張說仍舊奔忙於議定禮樂等事宜。八月，他與徐堅等人於集賢院研議封禪儀，同月，和玄宗合作改定樂章，準備在封禪大典上行用。十一月，籌備已久的封禪典禮終於正式登場並順利落幕。封禪結束後不久，張說又於開元十四年正月，奏請玄宗制定新禮，禮成後即為知名的《大唐開元禮》：

開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請改撰《禮記》，削去舊文，編以今事。集賢院學士張說奏曰：「禮記漢朝所編，遂為歷代不刊之典。去聖久遠，恐難改易。但今之五禮儀注已兩度增修，頗有不同，或未折衷，請學士等更討論古今，刪改、引用、制定之。」於是令徐堅、李銳、施敬本等檢撰。歷年，其功不就。銳卒，蕭嵩代為集賢院學士，始奏起居舍人王仲邱修之。二十年九月，新禮成，凡百五十卷，是為《大唐開元禮》。²⁵

封禪儀和制定新禮都是由張說率領集賢學士議定，可見得張說不只是一要讓麗正書院成為天子禮樂之司，集賢院亦然。在開元十四年時，張說和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等人的爭鬥漸趨激烈，不久後張說被革去宰相之職，隔年二月，玄宗又令其致仕，是故從開元十四年後，張說的制禮作樂的活動便停頓下來。

有學者認為張說勤於制作禮樂的目的是為幫玄宗粉飾盛時，討其歡心，而事實上張說對於禮樂的重視並非是從玄宗朝時才開始的，在他初步入仕途就已有這樣的傾向：

臣聞古者因人以立法，乘時以設教。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竊以緯武經文，布方策而非遠；英風顯號，流頌聲而可襲。未有反義悖德，而致昇平之政，棄禮違經，克以永終之祿。

養老用上庠之禮，教胄取大學之義。環水著辟雍之名，向陽表明唐之位。蓋所以享群瑞，朝諸侯，班正朔，調景諱，成簡易之基，崇久大之業也。²⁶

上文摘錄自張說的詞標文苑科對策，他在二十四歲時，就是靠著這篇策文受到武后的欣賞，定為天下第一，拜太子校書，步入仕途。而他終於能從流放地欽州返回京城時，還寫下「誰能定禮樂，為國著功成」²⁷這樣的詩句，充滿舍我其誰的豪氣。²⁸可見禮樂早就在張說的思想中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張說之所以會如此重視禮樂，原因可能有二：一是為提振儒學，二是為革除流行於唐代的晉人學風。上文曾言振興儒學是張說的政治理想，但儒學具有多個面向，該從何處著力？張說顯然不認為是漢代章句之學或是宋儒最重視的仁義道德，而是禮樂。另外，張說曾在〈與鄭駙馬書〉云：

晚尋莊周書，以天地為國，道德為身，老室之戶牖，孔門之棖闥，胎育仁

²⁵ 《通典》，卷 41。

²⁶ 〈詞標文苑科策〉，《張燕公集》，卷 11，頁 125-126。

²⁷ 詩名是「赦歸在道中作」，全詩為「陳焦心息盡，死意不期生。何幸光華旦，流人歸上京。愁將網共解，眼與代俱明。復是三階正，還逢四海平。誰能定禮樂，為國著功成。」《張燕公集》，卷 4，頁 40

²⁸ 張說在長安三年(703)，因不肯配合張易之兄弟構陷魏元忠而被武后流放欽州，中宗於神龍元年(705)登位後將他召回，前引詩即是在歸途中所作。

義。而晉朝賢士，乃祖尚虛浮，弛廢禮樂，其所遺失，將詣真宗不愈遠也。²⁹ 隱然有欲以禮樂對抗晉人虛浮之學的抱負，且由此更可知張說重視禮樂並非是為討好君主，而是在目睹唐初儒學衰落、晉學虛浮的情況後，欲透過禮樂來改革這樣的學術風氣。

四、餘論

自入唐以來，有鑑於南朝之敗亡，故唐人屢對「江左餘風」有所檢討。所謂「江左餘風」，表現在學術上，是指老、莊、易等三玄之學，表現在文學上，則是指流行於南朝宮廷中的無關政教、講求技巧、深具遊戲性的文風，學者統稱之為宮廷文學，而創作宮廷文學的就是一批圍繞在皇帝和達官貴人身邊的宮廷文人。張說在知掌集賢院期間努力提高學士的地位，並且招引一批文儒之士進入院中，他希望而這批文儒之士不再像以往是一批圍繞在皇帝身邊的文學弄臣，而是與君王講學論道之人，且彼此間是以道義相高，不再是重臣權貴的附庸。張說的努力，使得學士有擺脫宮廷文人身份的可能。另外，他還積極從事與禮樂相關的各類活動，希望藉此振興儒術、革除晉人虛浮之學。照這樣看來，張說任職集賢院期間的幾項作為，可能也是延續自唐初以來唐人對於「江左餘風」的批判。此外，或許我們也可從中捕捉到初盛唐間士風及學術文化風氣的轉換的消息。

²⁹ 《張燕公集》，卷 13，頁 141。